



新中国新闻史丛书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中国新闻报道史 暨代表作研究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lassical Reporting in New China

王辰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中国新闻报道史 暨代表作研究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lassical Reporting in New China

王辰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王辰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
(新中国新闻史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6151 - 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新闻报道—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7843 号

- 书 名 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
Xinzhongguo Xinwen Baodao Shi ji Daibiaozuo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王辰瑶 著
- 责任编辑 胡利国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151 - 4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281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丛书弁言

这套“新中国新闻史”丛书,缘起于200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的重点项目“新中国60年新闻事业史研究”。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申报并获批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2015年陆续付梓。丛书中所论“新闻业”,除了指涉新闻传播领域,还兼及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

丛书主编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丛书依托的国家项目展开前曾经举办研讨会,得到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清华大学教授郭庆光,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潘维、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陈力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等悉心擘画。

先后以不同方式介入这项工作的学者有:吕新雨教授、陈昌凤教授、刘海龙教授、王维佳副教授、陈彤旭副教授、林溪声副教授、王辰瑶副教授、黄卫星副教授、马学清副教授、涂鸣华副教授、王华副教授、常江博士、姚遥博士、吴风博士、关琮严博士、张垒博士、沙垚博士、张斯琦博士等。

迄今为止,项目及其丛书已经成就三篇博士论文(其中一篇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陆续发表数十篇专题论文,包括《南京社会科学》与《山西大学学报》两组笔谈,有的已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完成或汇聚了数部学术专著,除已纳入丛书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还有因其他缘故“花落他家”者,包括姚遥博士的学位论文《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作为第一套关于新中国新闻业的系列图书,丛书一方面尽量吸纳前人成果,一方面力图在多学科、新视野、全球史的视域中,审视六十多年来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希冀为中国道路的新闻传播及文化政治开辟新的理论空间,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学科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是所为盼,谨此告白。

目 录

导言 影响时代的新闻和影响新闻的时代	(1)
--------------------------	-----

第一编 理想照射下的新闻

“时间开始了!”

——开国盛典的新闻叙述	(13)
-------------------	------

打动人心的朝鲜战地报道	(25)
-------------------	------

社会主义好

——新闻报道中的新旧对比模式	(32)
----------------------	------

讴歌劳动:劳动者主体地位在新闻中的彰显	(42)
---------------------------	------

新闻批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48)
-----------------------	------

“放卫星”报道的叙述逻辑	(59)
--------------------	------

建构“社会主义大家庭”	(67)
-------------------	------

典型报道的巅峰

——学习雷锋好榜样	(73)
-----------------	------

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	(87)
-----------------	------

第二编 “启蒙”话语中的报道

新闻界与思想解放之风	(95)
------------------	------

“拨乱反正”时期的新闻报道	(102)
---------------------	-------

新闻批评的复兴	(109)
---------------	-------

经济新闻:边“试水”边改革	(120)
从万岁到您好: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改革	(127)
调查性报道的登场	(135)
时代困惑催生的“深度”报道	(142)
价值观大讨论	(154)
体育报道的强国梦与民族心	(164)

第三编 改变新闻“语态”

“春天”的故事	(175)
发现“生活”的新闻	(185)
当新闻遇到市场	(195)
迈向职业化的新闻舆论监督	(206)
媒体发声:时评的勃兴	(223)
新闻直播时代来临	(235)

第四编 新世纪的新闻使命

假如媒体缺席	(253)
财经新闻:奇峰突起	(266)
公共危机,公开报道	(274)
拷问良知 ——新闻界的自律与他律	(284)
“节制”报道:一种新新闻叙述观	(297)
网络时代的新闻图景	(306)
后记	(314)

导 言

影响时代的新闻和影响新闻的时代

新闻与时代或者说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耐人寻味,甚至颇多争议的问题。显而易见,将新闻与历史联系起来的是“事实”。新闻和历史都与事实打交道,都以事实为本体,都有信奉乃至崇拜事实的职业传统。直观上,新闻与历史不同只体现在事实记录的时间性上——新闻是新的,而历史是过去的。因此,“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等表述就成了描绘新闻与历史之关系的通用表达。当然,新闻界比历史学界更愿意使用这种表达,因为对有着悠久传统和崇高地位的历史的比附,更有利于说明“什么是新闻”。例如梁启超在他重要的新闻学论文《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指出: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①

然而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是否真能如此简单而和谐?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就能让新闻与历史相互转换?一些学者提出的否定性的看法,也不无启发意义。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激发了以社会学视野研究新闻的学术兴趣,他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新闻进行了知识形态学的考察,其中特别谈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因为它(新闻)关注事件,因此它与历史知识较相似。但是,新闻不是历史,它的事实也不是历史性的事实。新闻不是历史,因为它处理的是孤立的事实,并不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探究因果。……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新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闻,主要不是和过去及未来有关,而主要是和当下相关——哲学家所描述的“似是而非的当下”(the specious present)。^① 帕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新闻与历史虽然都关注事实,但关注的事实却是不一样的。新闻关注的是当下的、具有普遍兴趣的、片断性的事实,而历史关注的是能对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历史事实。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观点,只有被历史学家所关注所书写的事实才是历史事实,才会成为后世所知的“历史”,否则事实就会被遗忘在“有关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是否只是历史的部分“原材料”,而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动成为“历史”? 尽管这个观点可能会让雄心勃勃的记者和对新闻界满怀理想的学子感到扫兴,但是,的确如此。例如以历史的标准来看,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阶段,但爬梳期间的新闻报道时,笔者深深感到绝大多数“当时”的新闻都已落入了卡尔所说的“深渊”之中,除了极少数研究者偶然翻检故纸堆外,几乎没有可能“再见天日”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新闻相比于历史来说就是“等而次之”的——新闻记者出身的美国学者伯纳德·罗斯科(Bernard Roschko)在其代表作《制作新闻》中分析了“新闻不是历史”的原因,他认为新闻属于“知晓性的知识”,而历史属于“理解性的知识”,因而它们关注事实和运用事实的方式必然存在本质不同。“知晓性的知识”重在明确发生了什么事,而“理解性的知识”重在建立事实之间的关联,为所描述的事实寻找恰当的历史定位。这两类知识形态都为人类社会所必须,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按照帕克的想法,在现代社会中,新闻的角色似乎还比其他形态的知识包括历史更显重要。他说:“我们的时代是新闻的时代,美国文明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记者的崛起。”^③ 尽管新闻与历史

① Robert E. Park,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5 (Mar., 1940), pp. 669—689.

②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Robert E. Park,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5 (Mar., 1940), pp. 669—689.

不同,但并不排除两者出现交集——一些杰出的事实记录者兼具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角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希底德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记者。虽然新闻在本质上不可能自动成为历史,但有抱负有作为的新闻记者还是希望能写出“名留史册”的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报道无法被史家忽视的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实。比如,美国合众社记者梅里曼报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历史在我们面前爆炸》。其二是在报道中不仅“告知”而且“解释”,将“知晓性知识”和“理解性知识”融会贯通,提升新闻报道的“历史感”。相对来说,记者采用途径一会更得心应手一些,而采用途径二难度更大,而且运用途径二写出的作品有时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比如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拉莱·科林斯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在1965年出版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巴黎烧了吗?》。两位记者用三年时间查阅各方档案,采访了800多人,将近千个具体的事实串联起来,描绘出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这可谓是将“知晓性知识”上升为“理解性知识”的典范。虽然这种做法不是新闻生产的常规,但其思路值得有历史抱负的新闻记者借鉴。

尽管新闻与历史不同,但也不排除两者互相影响。新闻与历史同为对社会的建构性叙事。历史修辞学者詹姆斯·柏林(James A. Berlin)在其“智识场域”(Noetic field)理论中指出:叙述性的活动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界定着文化图谱中的可认知对象(和不可认知的对象),认知者的属性,认知者、认知对象、接受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的性质,并构成某种“智识场域”。^① 新闻可以说是当代社会最大规模、最经常、也可能是即时性影响最大的“措辞”(Rhetoric)和“命名”(Andrew R. Cline)活动。美国新闻学者安德鲁·克莱恩认为新闻活动即是当代文化中最重要的话语实践,它反映并驱动着占主导地位的“智识场

^① James A. Berlin, *Writing Instru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College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84.

域”,因此新闻自身的叙述问题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建构着社会文化中的主导性修辞。^①但是,新闻这种规模大、即时性强的叙事要长久地影响社会,则势必需要借助“盖棺定论”式的、历时性强的历史叙事的帮助。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么,历史便是新闻的定稿或完成稿了”^②。

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明本书存在的意义。一般来说,书写以某某为对象的一段历史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该对象理解一个时代的变迁,二是理解一个时间段内该对象自身的变化。例如,堪称新闻史经典教材的《美国新闻史》,其原书名即是《新闻与美国:大众传媒所解释的历史》。作者不仅强调要通过大众传媒的发展看美国历史的变迁,也强调要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宏大背景来解释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本书的用意也与此相仿,一方面想通过对新中国六十多年来重大新闻报道的梳理,用报道“串起”一段当代史,另一方面是想在当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下体察新闻报道的意义和变化。至于是否实现了这一用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用意,读者诸君自可评判。

如何实现这一用意呢?新中国新闻报道作品浩如烟海,且不说全部阅读绝无可能,即便可能,如此庞杂琐细、千头万绪的事实报道对于读者来说也是毫无意义,因为将一个时代所有的新闻作品简单累加并不等同于对这个时代有了很好的理解。因此,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必须要借助历史叙事的方法,一是以史家的标准对新闻报道进行“筛选”,筛选出那些足以串起历史,对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和新闻代表作;二是将新闻报道乃至新闻代表作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去分析和理解,同时也将新闻报道作为观察口反观社会的变化。这或许是本书自认的新意所在:与一般的新闻史以整体新闻业为对象的观察方式不同,本书以具体的新闻作品为落脚点,侧重分析新闻报道的内在变化;与一般的新闻作品集多集纳少分析,或者多从新闻采写经验的角度分析不同,本书将具体的新

① Andrew R. Cline, *Toward a field theory of journalism*, http://rhetorica.net/field_theory.htm.

② 李彬:《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2月15日。

闻作品放置在时代背景下,主要的着力点不在新闻技巧上(尽管有心的读者不难从这些新闻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新闻技巧),而在新闻与时代的关系上。正如本书标题所说,新闻报道与时代是一种双重变奏,重大的新闻报道往往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影响了时代,推动了时代,是时代旋律中特别强而有力的音符;同时,也只有时代的脉络下,方能更好地理解新闻报道。为什么有些新闻报道会成为经典?新闻自身的原因比如采写水平等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时代的原因。是时代之“势”,将一些特定的新闻报道推到了重要的节点上,成为对一个时代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而仅仅拘泥于从新闻技巧上去学习经典作品,其实是弃“道”取“术”的做法,不客气地说,无异于东施效颦。

对当代新闻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对本书所选的新闻代表作应该都不会陌生,但是对这些代表作的分析如果不放置在彼时彼地的语境下,就很难有深刻的理解。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新闻媒体上最有分量的作品是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等长篇理论文章。这些讨论哲学问题的理论文章,能在新闻媒体上着重发表,并引发全国性震动,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是很难想象的。再比如,新闻专业的学生可能在很多新闻写作教材中都看到过一篇1980年的短新闻《经济学家赶集》,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恐怕现在的学生也很难品味出这篇连标题在内只有395个字的新闻的好处。这篇短小的新闻只报道了“一件小事”——经济学家薛暮桥赶集,但是却点出了应该发展集贸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的大问题。这种小与大的结合,一方面体现了新闻界当时厉行的文风改革,另一方面体现了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报道热潮中推促改革、引领时代的主动性。同样,为什么90年代中期《北京最后的粪桶》《五叔五婶》《许姐的夏天》等一批描写平头百姓的“小人物”新闻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平民化”视角在今天并不陌生,但在当时却是一次重新发现“生活”的新闻观念的深刻转变。

在时代的情境下分析新闻报道,应该有“同情之理解”的心态。巍巍

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曾经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人,并长期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但在2001年新课改后,《谁是最可爱的人》开始陆续退出各地的语文教材,这引发了社会上普遍的关注。在讨论中,围绕《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争议也开始出现,如认为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太过暴力、血腥,意识形态色彩太浓等。但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篇作品,在50年代入选中学课本时却因不够革命而被删掉了部分描写。叶圣陶主持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编选工作时,有人提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有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太小资情调,不够革命,要删掉。到1978年人教社重新编写课本时,这句话才又悄悄恢复,因为这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的“后来者”的批评,如果完全无视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很容易变得简单和武断。

当然,“同情之理解”绝不等于无条件地接受和赞美。时代按照她自己的逻辑删选出的经典作品,并不意味着“后来者”不能提出严肃的批评。比如,著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报道本身而言,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也不能因此无视围绕报道产生的争议,以及带给人们的反思。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揭秘”“探寻真相”“背后的故事”之类的文章,引起人们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报道与它的时代。《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聚焦点在救援本身,对于被救的六十一个民工笼统地称为“阶级弟兄”,认为救援本身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一逻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然而,事实的“日常性”往往无法与时代的主流逻辑完美契合,它时常反叛、嘲弄着某种既定的宏大叙事。围绕这篇报道的争议即是由此展开:被救的六十一位民工并非全是“阶级弟兄”,有一小部分是地富出身,尽管在“平陆事件”发生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他们都被当成了“阶级弟兄”,个人成分改写成了“下

^① 潘晓凌等:《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删不掉的“秘密”》,《南方周末》2009年6月24日。

中农”。但当此事尘埃落定,抽调去修路的民工回到原来的村庄后,那些地富出身的人仍然成为批斗的对象;此外,报道中没有涉及的中毒原因,在当时也被认为是阶级敌人投毒,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经后人仔细调查,发现投毒主犯张德才出身贫农,但曾为日伪政权做过事。投毒动机主要是因为睡觉错过了上工,受到群众批判会的批评,遂产生报复心理。^①日常事实的琐细有时会构成对历史大叙事的顽强的嘲笑,这对新闻人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作者之一王石,一位令人尊敬的老新闻人,曾对一位新闻后辈坦言: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有局限”^②。

除去当时的影响力,新闻人总还希望报道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点上,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的心曲颇有相通之处。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并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这的确很难。但对于当下事件的记录者来说,更多地关注事实,尤其是那些看似不容于时代主流的事实细节,更多一些历史感,在什么样的意义具有恒久价值的问题上有更多的思考,也许这个新闻与时代的难题就会有让人更满意一些的答解。

作为一本新闻报道史,本书希望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报道之间建立“关联性”,用报道“串起”历史而不只是孤立地分析新闻代表作。本书按照时间线条粗分为四编,分别是:第一编,理想照射下的新闻;第二编,“启蒙”话语中的报道;第三编,改变新闻“语态”;第四编,新世纪的新闻使命。读者可以看到,新闻报道的内在变化是有阶段性的,每一阶段都会有相对明显的与其他阶段相区分的特色,而且这种阶段性既与时代的重大变动密不可分,也有新闻自身发展的内在性。每一编之下的各小节则侧重该历史阶段中新闻报道发展的某一个方面,并在概述新闻报道的变化时辅之以对这一阶段新闻代表作的具体分析。除了以这种章节的方式搭建不同时期新闻报道的“关联性”骨架外,读者还可以在不同章节之间找到新闻报道在时代变奏中主题复现、遥相呼应的血脉。

① 石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鲜为人知的史实》,《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② 江菲:《报人王石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1日。

比如批评性报道的几次高潮就是既有前后衔接的延续,又有破茧成蝶的质变。现在提到批评性报道,人们多以为受惠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熏陶。实际上,批评性报道兴起的直接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理念。如早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改版社论《致读者》就明确地表示“报纸亦应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①这种以新闻批评为武器,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推行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也运用得较多,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本书在第一编第五节“新闻批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选取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黄逸峰事件”进行分析。《人民日报》在“黄逸峰事件”中所发的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体现了建国初期对新闻批评问题的基本观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在1978年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迎来的思想解放的风气中,新闻媒体又开始试图衔接和延续50年代乃至可上溯到延安时期的党报“新闻批评”的传统,其最初的话语方式与内在逻辑与延安时期和50年代初期别无二致。80年代初新闻批评的复兴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功绩,它对官僚主义的尖锐批评,促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民主氛围的形成;它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加快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步伐;它延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营造出上下合力、万众一心的改革共识。此外,它还突破了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否则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心理禁区。80年代不少经典的新闻批评报道深入人心,影响很大,而且一直被新闻界引以为豪,但不得不说此时的新闻界尚缺乏对新闻自身特性的清醒认识和独立思考。新闻批评应是一个开放的、连续性的社会实践过程,而不是一次性地用“正确”去批评“错误”。因此新闻批评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节制”。这种“节制”既出于对新闻与事实关系的敬畏,也出于对媒体作为一种话语权力载体的自律,以及对新闻与民意、社会情绪关系的冷静思考。做到了这些,“新闻批评”才可说不仅“恢复”,而且朝着成熟、有建设性的轨道上

^① 《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发展”了。而这一变化要到 90 年代中期新闻批评性报道开始“栏目化”“建制化”之后才逐渐出现。带有情感色彩的“批评报道”也慢慢地被更具稳定性的“新闻舆论监督”所取代,这表明新闻舆论监督开始了向职业化方向转变的探索,这种探索有重大价值,而且远未结束。比如,如何将新闻职业的监督守望职能与中国既有的新闻批评传统衔接?如何将具有实践智慧的新闻舆论监督对“度”的把握,落实为更有操作性、稳定性和透明度的制度规范?新闻职业伦理在实践中刚启其端,离新闻界共识的形成还有很大的距离。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变化更多也更快,如何跟上变化,并在变化中成熟完善自身——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 90 年代开始的探索,可以说仍是路漫漫其修远。

历史叙事常常是带有总结性的“确定无疑”之语。但本书仍然希望在进行事实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和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新闻报道实践中,一个频繁出现的问题是事实与意义的关系,用新闻界更熟悉的表达就是“事实”与“说话”的关系。只崇拜事实,就像 19 世纪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事实!我只要事实!”,这对新闻来说是行不通的。作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叙事”,新闻报道必然会对偶然、无序、纷杂的现实事件进行选择、编排、赋予意义、确定秩序。新闻报道对一个偶然事件的“命名”,甚至可以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象征性话语。这的确是新闻对时代的影响力甚至权力所在,无视这一点或者忌讳这一点,是一种“鸵鸟策略”,并不能给新闻带来真正的“客观公正”,有时甚至让新闻沦为权势集团的传声筒而不自知。但是,反过来说,过分强调“意义”而忽视对“事实”的呈现,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应该说,长期以来中国新闻报道的特点就是更注重对事实的意义开掘,而鲜少注意事实的呈现方式。新闻业对时代的观照倾向于直接介入、直抒胸臆,力促其变,这既是忧患中诞生的中国近代新闻业鲜明的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传统的延续,也源于较单纯的党报体系下的媒体定位。但是这种新闻报道模式的弱点在于自信有余自省不足、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意图鲜明规范不足。因此它容易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新闻报道的立场、

情感、倾向在短时间内变动过巨的情况,也容易在时代激情退却后让人指摘报道本身与事实真相的距离。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新闻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叙述方式粗疏、急躁的一面,开始反思事实与观点的关系,但迄今仍未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新世纪以后,在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复杂的情况下,新闻当以何种方式来观照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新闻报道采写,常被归为某类技术性的知识。在新闻媒体,它是业务能力;在新闻院系,它是实务课程。而本书多少存了些挑战这个既定观点的念头。新闻报道不仅是“术”,也是“道”,它为时代“命名”,也因时代改变,新闻报道自身也许不是历史,但它可以串起历史,促成我们对既往的思考,启发着我们在未来的选择。读者可以把本书当成“故事之书”,因为它讲了关于中国新闻报道的很多“故去之事”,而且自身也是一个关于六十多年来新闻报道与时代发展的“大故事”。当然,读者也可以把本书当成“问题之书”,在以往的新闻报道实践中,哪些传统被尘封在历史之中,哪些传统还依然鲜活?哪些观念需要反思、需要追问?哪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让笔者头疼的问题也许也会让读者头疼——但这也应该是新闻学最富有魅力的部分——它把新闻思考从“业务”层面拖拽进“哲学”层面,从而给新闻工作增加了厚重和反思,使之成为最具有意义感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一。